



页

寿宁寺之俗称“打钟寺”

为什么要把寿宁寺俗称为打钟寺呢？个中理由也不一般。自古以来，沙门寺院计时告众，均为钟、鼓二物，所谓晨钟暮鼓，最初便出自于寺而不是市井，也不在宫廷。寺庙幽深，纪律森严，晚击鼓，早撞钟，以报时间指导或指挥僧众精进修持，功课作业，才能寺规操持，秩序井然。试问哪座寺庙无钟楼？哪座寺庙不敲钟？把寺宇中撞钟的常规推理为寺庙之俗称的来源，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？还是合乎沙门礼仪？回答均是否定的！有悖常理的！但太原的寿宁寺，就产生了这个有悖常理的俗名“打钟寺”。

违背常理的，往往难以维持其生存；不合乎逻辑的，往往难以被认同，很容易在时间的拷问中被忘却，被淘汰。但是，寿宁寺这个看似不合乎逻辑、有悖常理的俗称“打钟寺”，却是穿越了历史的时空，既没有被淘汰，也没有被忘却，一直流传到如今。再早的不说，就类似我这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太原人，或较长时间生活于太原的外籍人，在时间、环境的濡染下，凡涉及这个名称时，都是直呼“打钟寺”或者“打中市”，而不是“大钟寺”“大中市”。“打”是上声，用“v”表示，“大”是去声，用“u”表示。这不是无病呻吟，也不是闲下扯篇，而是要弄清楚一个太原钟楼街上的历史过往，探索一下街史发展上的一个短板，“金元时期”的东门正街发生过哪些曾经有过、却没有史载存录的遗憾；要钩沉出史上既有，却在传承中失却的、被遗忘的史实。

现存的太原府、县地方志乘中，有不少关于“鼓楼”的记载，《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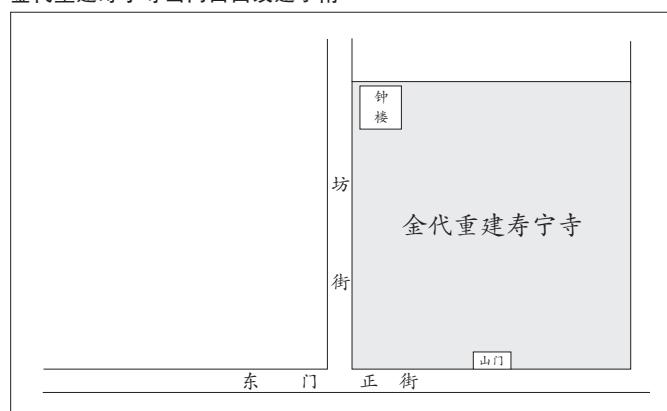


乐大典·
太原府》
在记录子城
时，曾有一段文
字：“南门有‘河东军’
额，因唐旧也，鼓角刻漏
在焉，民间谓之‘鼓角楼’。”

这个鼓角楼在子城什么地方呢？在其南城墙的北侧，“揀马厅”之东，“司录厅”之西，“右狱”之南，名字叫做“谯楼”，民间叫它“鼓角楼”。何谓“谯楼”？《三国志·吴志》说得明白：“诏诸郡县治城郭，起谯楼，穿堑发渠，以备盗贼。”可见，早在三国时代，东吴皇家便颁布诏令，要求郡县治所在的城郭，建谯楼，配谯鼓，挖堑护城河，以备在盗贼和外敌侵扰城池时，登上谯楼瞭望，敲响谯鼓告之，组织有效的对抗和防御。这个谯楼在宋时名称未变，再往后则更名为“鼓楼”，建址也从城垣移到了城中，它原本是鼓楼的“先祖”。

宋太原城中有“鼓楼”，史乘留下了这鲜见的一笔，但翻阅诸多史料，却没有见到关于钟楼的点滴记载。或许，钟楼原本就不是与鼓匹配的产物，而是后来城市发展需要的完善和补充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钟楼最初是佛家寺庙的产物，最晚在唐代的沙门寺中，已经有了放置钟的专门建筑，以利于钟之高悬，按时辰敲响，指导僧侣和善男信女的佛事活动。寺庙的高墙是隔不断钟声的，宏亮的钟声客观上为寺庙环周所居的民众，发出了规律的时间报导，时日既久，钟声影响和指导了人民的作息、劳动，逐渐

金代重建寿宁寺山门由西改建于南



金代重建寿宁寺山门由西改建于南

钟楼街史话之

千年街史略钩沉

5 从寿宁寺到打钟寺

王继祖 王琛

东门正街上的寿宁坊，与东门正街同时建竣于宋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。从《永乐大典·太原府》中可以看到，被大火烧掉的北汉都城中，创建于北齐的“十二院”之院名，全部移植到了东门正街两侧的新坊间中，还有当初唐明镇上的寺院也麇集于此。其他搁过，我们仅说寿宁坊中的寿宁寺。

寿宁坊中的寿宁寺

寿宁坊是东门正街最有名的坊，坐落在东门正街最西头北侧，坊门开在东门正街上。《元一统志》便载：“寿宁院（寺），在府寿宁坊街东。”东门正街是东西走向，只能有街北、街南之分，而寿宁坊的坊街将寿宁坊分为东、西两片，说明此坊街是南北走向，坊是以北为上，坊门自然是坐北朝南开在官街北侧无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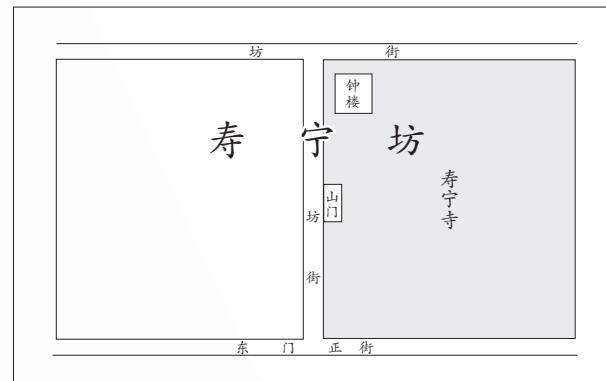
寿宁坊建坊于太平兴国七年，公元982年，而坊中的寿宁寺，创建时间却是七年之后的端拱二年，公元989年，其寺额的书镌年代以及今虽不存在却有志乘所载的“端拱中建院

碑”，都是最好的证明。过往有些志乘、史籍说寿宁寺创建于“大中祥符四年”“大中祥符八年”“大中祥符年间”或失之粗枝大叶，将真

成 为 人 们 生 活 中 的 依 托。唐 代 天 宝 年 间 的 进 士，著 名 的 盛 唐 诗 人 张 继，有 一 首 很 有 名 的 诗，叫 做 《枫 桥 夜 泊》，其 中 的 “姑 苏 城 外 寒 山 寺，夜 半 钟 声 到 客 船”，便 是 寺 庙 钟 声 对 周 围 环 境 和 生 民 产 生 影 响 最 好、最 生 动、最 形 象 的 写 照。

由彼及此，宋太原城中，不仅仅有见载史册的“谯楼”，也会有史册中无载的钟楼，作为宋、金、元时代太原城中名声颇大的佛家寺宇寿宁寺，难道会没有钟楼，钟楼所发出的钟声不仅会夜半传入城中百姓家，白日又何尝不是。时日一久，城中民居百姓、商家士绅，甚而至于官府衙门，都无法例外地受着其寺钟声的波及和影响，按着它的时刻去作息，去活动，逐渐成为不能超脱的依赖。这种闻钟而动的举城行为，自然会产生其该有的名称或称谓，于是，寿宁寺的钟一打，钟声便引导着民生的活动。于是“打钟”之称油然而生，“打钟寺”之名脱口而出，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、约定俗成中，“寿宁寺”，这个充满吉祥雅训的寺名，渐渐淡出人们的口呼脑记，而“打钟寺”这个俗称，却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水乳交融，代代继承。渐渐地，“寿宁寺”成了史册记载中的专用名称，而“打钟寺”却演变为城中妇孺皆知的寺名。就如同，太原人知道哪儿是“水西门”“旱西门”，谁还记得“振武门”“阜成门”！都知道“大北门”“小北门”，哪还能想到“镇远门”“拱极门”。

古寺终于完成了它从正名寿宁寺到俗称打钟寺的沿革和嬗变，并随着打钟寺名日益深入人心，寿宁寺名自然而然地渐渐淡出太原人的使用和记忆。这种此消彼长的“蝶变”还告诉后人，当年



宋代寿宁寺在寿宁坊中位置示意图

宗立《太宗御书碑》的年代，误作寿宁寺的创建年代，或没有读到原书，以他人讹记为本，以讹传讹（详见见后文）。

当初的寿宁寺并不是并州太原城中名声最为显赫的沙门佛寺，而是规模并不太大的寿宁广化院，只是后来不知何故引起了赵官家的重视，太宗皇帝亲赐皇家图书于寺中。对此，地方志乘和相关书籍都有记载，而更为隆重的则是，太宗皇帝晏驾之后，

其皇子真宗皇帝赵恒，亲自撰文为乃父歌功颂德，镌刻《太宗御书碑》立于寺中。于是寿宁寺名声日大，地位日尊。而真宗所制之碑一

的寿宁寺、后来的打钟寺千年传承，时兴时衰，但寺址千年未变，在金、元时代以寿宁寺之俗称打钟寺为地标的东门正街、后来的钟楼街，发展到元末明初扩城之前，街侧之建筑时有更替，寿宁坊消失了，寿宁寺依然；寿宁寺之名淡出了，打钟寺名却仍然传承，它们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东门正街相伴，一直到明初太原城扩建。

几句甄别之言

依稀记得，郝树侯先生的《太史话》中，关于打钟寺有一段文字：“大中市原名寿宁寺，建于宋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，原有书库，宋真宗亲写碑文记其事。金朝大定十六年（1116）重修。明永乐八年（1410）寺内建起一座钟楼，而俗呼为打钟寺了。”

读罢这段文字，我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，细细想来，有几处还需斟酌。首先，几种地方志乘，对寿宁寺的创建年代说法不同，前文已有简述。史实是其寺创建于宋太宗端拱二年（989），史料中的“端拱二年额”乃是讲寿宁寺建起后，寺名匾额于端拱二年镌刻悬挂在寺门。所谓的“建于大中祥符四年”“大中祥符八年”乃是讹记讹传。笔者就曾受“大中祥符八年”建寺之说的影响，深有感受。

直流传下来，直到清末尚存，清人朱彝尊有专文作记（此是后话）。

由于宋初的两位皇帝如此看重寿宁寺，所以在宋、金、元时代，寿宁寺较城中其他寺院被高看一等，并且在金朝天会年中还进行了修葺、重建，山门由西改置于南，以至于移建来的“十二院”、过往的“唐明寺”“观音院”等，早已遗址无存，而寿宁寺却一直传承保护了下来，直至明清时代仍是香火不息，衣钵承继。

述及寿宁寺，总是不能令人忘怀的是它的另一个俗名“打钟寺”。打钟寺之俗称产生于何时？志乘记载颇简，简到让人难以弄清其理究。明万历《太原府志·古迹》说：“寿宁寺，俗呼打钟寺。”明代修志者把此简记归类于“古迹”，明确告诉我们“打钟寺”之名是过往的古事。明之前的“古”范畴太大了，宋是古，金是古，元也是古，但是，应不会包括明初，即万历之前的明代，因古入，尤其是明、清两代修志、作史，把本朝称为“国朝”，当不会称“古”，更不会将其列入“古迹”去记载。可见，寿宁寺俗称为打钟寺，最晚当在元代，亦或更早的金代。

其次，打钟寺之俗称，产生于明代之前，并不是明永乐八年。而且俗称之为“打钟寺”，产生，不似正名之命名，立下而定，它需要在较长时间的传播中约定俗成。

第三，也是较为重要的。寿宁寺中一直就有钟楼，而不是“明永乐八年建起一座钟楼”。即便有永乐八年建钟楼之事，也应该是“重建”“重修”，而不应该是“建起”，因为“建起”两字，与“重建”“重修”的词意相差甚远，容易给读者造成寿宁寺原来没有钟楼，直到永乐八年寺内才“建起”一座钟楼的误导。重读那段引文：“明永乐八年寺内建起一座钟楼，而俗呼为打钟寺了。”完全可以说，原作者就是要告诉读者，因为永乐八年寺内建起一座钟楼，所以产生了寿宁寺被“俗呼为打钟寺了”的结果。